

励耘文库

# 谭五模

Tan Pimo Juan

谭得伶/编选

# 模

##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 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励耘文库

谭正模  
卷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谭丕模卷 / 谭得伶编选.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

(励耘文库)

ISBN 978-7-303-15589-7

I. ①中… II. ①谭…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C53 ②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9576 号

---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mailto:beishida168@126.com)

---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40 mm

印张: 20.25

字数: 349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杨帆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张同龙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 总序

“百年师大，中文当先”。描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历史，这是一句经常被征引的判断。在一个较为抽象的意义上，它的确昭示了某种令人鼓舞的气象。不过，“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实在曲折多变，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也可谓是源流繁复，“当先”的真实意义常常被淹没于时代洪流的连天浪淘之中，作为“思想模式”与“学术典范”的师大中文传统期待着我们更多地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

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肇始于京师大学堂，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有1908年5月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月，从京师大学堂母体诞生了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翘楚的北京大学。“办理学堂，首重师范”，作为与北京大学“一奶同胞”的北京师范大学，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引领了现代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其首功勋绩由此铭篆于史。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里走出了符定一，我们优质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让这位著名的教育家与语言文字学家在后来创办湖南省立一中、执掌岳麓书院之时胸怀天下、垂范后学，培养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优秀青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文学科更是云集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精英，如鲁迅、黎锦熙、高步瀛、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不时应邀前来讲学的还有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思想名流，可谓盛极一时。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辅仁大学，京师中文学科的漫漫历史清晰地记录着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历程与教育历程，这里，活跃着众多享誉中外的学术巨匠，书写了现代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华章：从九十多年前推行白话文、改革汉字，奠定现代汉语的基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开创现代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卓越贡献，诸多学科先贤都将自己坚实的足迹留在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旅程中。

伴随着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和引领现代中国学术坚实旅程的，则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风波与激浪。这里交织着进步对落后的挑战、正义对邪恶的战斗、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作为民众教育基本品质的彰显，我们的学术精

英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超脱于现实，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关注社会、“为人生”的责任和理想。中国第一流的语言文学学术哺育了中国优秀的校园作家，从黄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到苏童、毕淑敏、莫言，他们以自己的热情与智慧描绘了“老中国儿女”的受难与奋斗，为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思考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同样，在五四运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和抗日的烽火里，北京师范大学的莘莘学子与皓首穷经的教授们一起选择了正义的第一线，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仅以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更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着中国士人威武不屈、身任天下的人格理想，他们的选择铸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另一重令人肃然起敬的现实品格。

质朴坚韧的学科探求与身任天下的忧患意识，这不就是值得我们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的学术传统么？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励耘文库》中增选一套能够记录、保存、彰显师大中文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系统地总结我们曾经有过的学术业绩和文化贡献，希望今人能够借此缅怀我们的历史，又不断从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的繁荣与精神的隐忧并存、文化的多元与选择的歧路同在。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家、新的学术事业的继承人，如何回首我们的历史、领悟我们的使命，如何理解我们的传统，这些话题本身的复杂与沉重远远超过了词语表述的轻松。在这个时候，重温先贤的智慧或许大有裨益，但愿这些温润的文字能够引领我们重返深厚的过去，走向更为辽阔的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励耘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10日

# 目 录

导语/1

中国文学史纲(先秦—唐)/4

郭预衡先生新序/4

一、绪 论/10

二、原始共产制时代(唐、虞、夏以前)的文学/17

三、奴隶制时代(殷商)的文学——约公元前 17 世纪至公元前 12 世纪/22

四、地方分权的封建制时代(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的文学——约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26

五、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创始时代(两汉)的文学——约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63

六、封建军阀混战和外族侵略时代(三国南北朝)的文学——约公元 2 世纪至公元 7 世纪/105

七、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再建立与藩镇割据时代(隋、唐、五代)的文学——约公元 7 世纪至公元 10 世纪/157

编后记/215

我对于李煜词讨论的一些意见/216

努力搞好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219

杜甫的六首诗——关于“三吏”“三别”/224

何谓唐宋八大家? /230

从学术文化交流加深中印友谊/232

珍贵的友谊/235

《文选》讲义/237

附录一 《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序/248

附录二 《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出版座谈会纪要/250

附录三 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277

附录四 殉身文化 高风永存/299

附录五 著述系年/309

# 导 语

谭丕模先生原名毓规，字铭洪，学名洪，号丕模，后以号行。又号披蓠，笔名洛如、一泓、千因、孤君、斯徒、曙光、平、规等。湖南省祁阳县湖塘湾人。生于公元1899年5月19日，殉身于1958年10月17日。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中国思想史家、教育家、革命的文化活动家。

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好学深思，追求进步，于1922年考进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预科，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29年与北师大同班友翟凤銮喜结良缘。翟凤銮成为谭先生的终身伴侣和事业上、生活中的得力助手。

先生的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在抗日战争烽火中，辗转南北各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北平历任北平师范学校、华北学院、民国大学、朝阳大学、北平女一中等教职；30年代末至抗战胜利前，奔走于南方各地，先后在民国大学(溆浦)、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粤北)等校任教；1945年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任桂林师范学院(贵州平越，随徙桂林，又迁南宁)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9年湖南解放，先生被任命为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3年，调回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

先生不仅是一位教授，也是一位革命的文化活动家。从早期与曹靖华等组织“北平作家协会”，到抗战时期任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和文教委员会主委，组建文抗会，并编撰《抗战文化动员》等书。抗战胜利后，又和欧阳予倩等筹建“桂林文化联谊社”“全国文化协会桂林分会”，并举办文艺训练班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担任长沙市文联、湖南省文联主席，中南文联、中南作协常务理事等职。

先生又热心报刊的编辑，大学毕业后即担任《新晨报》副刊编辑主任，旋又和吕振羽等创办《新东方》，又先后编辑《文史》《盍旦》《时代文化》《中苏》半月刊等进步刊物，使之成为文化战线的重要阵地。先生在编辑的同



时，又在刊物上发表了許多战斗的文章。湖南解放后，先生又着手创办《湖南文艺》。北上后，又兼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文艺学习》的编委，为新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先生学兼中外，博通古今，其著述遍及文史哲各个领域，尤以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为最。其中用力最勤的是《中国文学史纲》的编写，八易其稿，四次出版。思想史有《宋元明思想史纲》(1936)、《清代思想史纲》(1940)等，先生被赞为“30年代屈指可数的中国思想史拓荒者之一”<sup>①</sup>。其他专著还有《新兴文学概论》(1932)、《文艺思潮之演进》(1933)、《新文学比较研究》(北平民国大学讲义)(1934)，以及未见传本的《物观的伦理学》等。这就涉及文学理论、新文学、欧洲文艺思潮、伦理学等诸多领域了。

先生著作涉及面之宽广，大多是为了教学的需要，但他不肯株守旧有的体系，用新兴的科学方法另辟蹊径，这是他过人的地方。

本书所选先生的论著，是根据文库总的要求，集中在北师大这一时段的，也是集中在先生用力最勤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其中分量最重的是他的代表作《中国文学史纲(先秦—唐)》。此书最早是1933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从古代一直写到1932年，是一部文学通史。以后不断修订，先后于1947年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中国文学史纲(第一分册)》，1954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史纲(上古至五代)》，最后于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上册)》，本书就选用了最后这个版本，它代表了先生生前最新的也是最后的研究成果。

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纲》，早有好评。对1933年版，邓绍基在《“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回顾和探讨》一文中说，此书“是中国最早旗帜鲜明地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编写的文学史著作”<sup>②</sup>。对1947年版，李何林在出版的当年就撰文说：“它提供了一本‘用进步的科学方法写作，不忽略文学本身的源流或发展，并兼顾与其他上层文化关联的文学史。”<sup>③</sup>对1958年版，郭预衡先生在《新序》(见本书)中称其为“半生精力所钟，多所创获”，“始终是在力图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虽也不免受到某种思潮的影响，但是，其难能可贵者，在于他始终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的自己的看法。既坚持了新的科学方法，又不随波逐流，从而完成了这部很有时代特点和个性特点的学术论著。”

① 黄宣民：《谭丕模：中国思想史的拓荒者》，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5)。

② 邓绍基：《“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回顾和探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编：《古代文学研究集》，1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③ 李何林：《读〈中国文学史纲〉》，载《文艺春秋》，4卷6期，1947年6月。

是的，先生以先进的科学方法，坚持求真求实的精神，独具慧眼的史识，质朴而具文采的缕析，卓然而自成一家的体系，编成的这部文学史纲，不仅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而且对我们今后的文学史研究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距今已达半个世纪甚至更前的著作，自然受到时代的约束和认识上的局限，也就必然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这是很自然的。若天假以年，以先生的才情与精神，一定早就出版了更新的修订本了，但这只能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美好希望了。

还有一个遗憾是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纲》修订本只完成了半部，自宋以后就阙如了。但略可告慰的是先生在1957年发表了长文《宋词》和《明清的章回小说》<sup>①</sup>。这是先生应北京市教育局邀请，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为中学语文教师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讲稿，从中可约略看到《中国文学史纲》下册的部分内容。

收在本书中的其他几篇有关古典文学的文章，大致也是应约而作，代表了先生对某些问题或某个具体作家作品的看法，其精神一如《中国文学史纲》，也是先生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字。而最后两篇访问印度的文字，可以让我们看到“殉身的文化使者”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识见。

放在最后一篇的《文选》讲义，可说是本书的一个特例，它大概写于20世纪40年代，是根据先生未发表的手稿整理而成的。它虽仅是草拟的梗概，但已为我们提供了先生浓厚的国学功底及字里行间透露的特见卓识，我们后学者也一定可以从中获得教益的。

本书附录所收的几篇文字，为我们勾勒出了先生在北师大期间的教学活动及为人：他忠诚于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他热爱学生及青年一代，呕心沥血地帮助他们成长；他重视教育艺术，循循善诱；他平等待人，和蔼可亲；他团结老教师，尽力发挥他们的专长……他确实是一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北师大校训的先行者和光辉典范。

我曾受业于先生，多蒙垂教。毕业后又曾在他领导的教研组学习、工作，可惜为时不长。今其女得伶教授编先生文集成，约我写个导语，深感惶恐。自先生殉难以来，我没有从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只能说是个中国古典文学的业余爱好者。深怕门外乱弹，有愧先生。虽请辞，未蒙允准，无奈，写上这些，以念先生在天之灵。

祝鼎民  
2012年9月

<sup>①</sup> 见谭丕模：《中国文学思想史合璧》，655～76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中国文学史纲(先秦—唐)

## 郭预衡先生新序

谭丕模先生这部《中国文学史纲》，自 1933 年迄 1956 年，凡八易稿。半生精力所钟，多所创获。

1933 年前，中国文学史的著作，虽然已经“不下数十种”，但谭先生认为：“因为研究方法的错误，以致没有一部能把握着中国文学过往的来程者。”<sup>①</sup>这话是言之有据的。与此同时，郑振铎在 1933 年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自序》中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郑氏曾以“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为己志，因此，在他这部著作中便增加了关于戏曲、小说的论述，以补救“肢体残废”和“贫血症”。

但鲁迅于 1932 年 8 月 15 日给台静农的信中却又指出：

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

可以看出，郑振铎所撰的中国文学史，侧重者在于“资料”，而鲁迅所看重的，则是“史识”。现在看来，相形之下，谭丕模先生这部著作所侧重者在于“方法”，却是比较接近鲁迅所说的“史识”的。他在 1933 年版的《中国文

---

① 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绪论》，2 页，北京，北新书局，1933。

学史纲·自序》中说：

我是用新兴社会科学的方法编这部讲义的……因为我用的方法与过去一般编文学史者不同，市上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材料，大致不可用，只好向历代文学家专集里去找。

又在此书的《绪论》中历数 30 年间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种种错误之后，说：

我们来研究文学史，应当纠正上述的错误，用新兴科学的方法——唯物论的辩证法去研究。前面已经说过，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其存在根据与其发展历程，绝对不是偶然的，超时间的，却是社会经济基础上之必然的产物，而被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社会经济基础一有变动，则文学内容亦随之而变动；因此，社会经济进展至某一阶段，则文学亦随之进展至某一阶段；社会经济停滞在某一阶段，则文学亦停滞在某一阶段。所以经济的变迁，是文学进展的动力，我们要把握着中国文学的史的变迁的真面目，只有采用这一个唯物论的辩证法。

这样的观点和方法，在后代的某一些人看来，也许未免有些机械；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公开提出运用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文学的史的变迁，是富有开拓性的意见。而且，在讲方法论的同时，又强调从历代文学家的专集里去找材料，从实际出发，不是停留于一般的教条。

谭先生在 1947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第一分册)》的《序》中提到他于 1933 年出版的这本《史纲》时，又曾说道：

第二次的稿，企图用科学方法写的，由古写到今，将近二十万字，一九三三年已由北平北新书局发行过，其中有很多不科学的意见。

这是经过十年之后，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又有了新的认识。“企图用科学方法”，而又未免“不科学的意见”，这是对于自己著作的实事求是的估计。今天阅读这本著作，确实如此，既有新的科学方法，这是很突出的成果，也有不够科学的意见，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

著者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对于历史上一些文学现象的分析，如对于《诗经》里面的“贵族生活的反映”和“农民生活的反映”，都是从作品实际出发，

凡所论证，都是确切中肯的。其中列举贵族生活之奢侈享乐；农民生活之贫穷困苦，联系当时社会经济状况，都是有据之言。其中有些看法，既不同于古代学者的传统之见，也不同于近时学者的某些观点。即以《关雎》一诗为例，著者认为其中反映的乃是贵族在饮食享用之外，“还要解决与食同样重要的性的问题”。此说既不同于“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旧说，也不同于“劳动人民的恋歌”的新说。

从实际出发，著者对于某些文学作品的分析是很深刻的。例如《九歌》，古今学者一般都是看作经过屈原加工的民歌，著者则特别指出其中反映了屈原自己的情绪。在“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之下，著者说：

这里所谓“捐余袂”，“遗余佩”的话，何等牢骚！何等悒郁！  
其意志何等坚决！

有人谓《九歌》是楚民的歌词，不过经他删削过，这话可靠不可靠，可不必追究，最低限变有他自己的意见在里头，这是可以断言的。

说《九歌》既是“楚民的歌词”，又有屈原“自己的意见在里头”，这看法相当重要。这同今天一般只是解释为民间歌词者不同。著者从作品中表露的“牢骚”“悒郁”和“坚决”的情绪加以推断，这是很有见解的。

从上面这些论述看来，著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写的这本著作，虽然未免偏重社会经济的原因，但在具体分析作品时，所得结论则是符合实际，并不偏颇的。

在 30 年代初期，运用新的科学方法来写中国文学史，这在中国文学史的撰述史上是开辟了新的途程的。谭先生此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即在这一部书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修正。

1947 年，印行了《中国文学史纲（第一分册）》，进行了较大的修改。1954 年作为“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出版时，修改、增订更多。1958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上册）》，这是最后一次修订，此书体现了谭先生文学史著作最后的成果。

50 年代初期，在古典文学研究界，曾有一股学习苏联文艺理论的浪潮。当时研究中国文学史，常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人民性等作为分析评述的准绳。谭先生一向追求新的科学方法，这时亦自不免接受这一浪潮影响。他在这个修订本的《绪论》中曾说：

我们认为人民性是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现实主义精神是文学创作方法。但这两者不可分割，而是紧密地联系着。因而，有人民性的作品，一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一定有人民性。

又说：

现实主义很复杂，它有时和浪漫主义纠缠不清。的确，这两种艺术方法，不是彼此孤立和没联系的。现实主义艺术中有浪漫主义因素，浪漫主义艺术中也有现实主义因素。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人民性”等，在当时古典文学的论著中大为流行，但大家虽然都是引为依据，而每个人的理解并不尽同。谭先生在这个修订本中陈述了上面的看法之后，还说了下面的话：

还有一些作品，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浪漫主义；既没有反动思想，也没有“人民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给人以新鲜的感觉，或描写的精工，也应给它适当的篇幅来讲述。

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看法，突破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人民性的狭隘的理解，比较切合文学史的实际。

基于这样的认识，著者在这部文学史中便更加全面地论述了文学的发展和变化，对于一些作家和作品也有更为具体的分析和评述。例如关于汉代辞赋的源流，指出：

汉赋是出于《楚辞》，可是与《楚辞》各异其神；汉赋是出于纵横家，可是与《楚辞》各异其途；汉赋是出于《雅》《颂》，可是比《雅》《颂》的规模宏伟；汉赋是出于李斯的刻石文，可是比李斯的刻石文壮阔；这是一种文体发展错综微妙之所在。

对于汉赋的源流，历来看法不同，这里的引述是相当全面的。

对于汉赋作家的剖析，这个修订本也比较全面。例如关于司马相如，除了列述他的几篇辞赋之外，也涉及了他的“赋化的散文”，说道：

司马相如另一部分作品，表现汉武帝极度的权威与对外的武功，这可拿《难蜀父老书》和《封禅遗札》作代表。这两篇作品，是

一种赋化的散文。他歌颂汉武帝“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他歌颂汉武帝“仁育群生，义征不悖，诸夏乐贡，百蛮执贄”。这样过分地鼓励对外战争，那么汉武帝由对外族抵抗战争发展为向外族侵略战争，司马相如的作品可能是起过推动作用的。

这里所谓“赋化的散文”，是个新的提法；对于司马相如这类文章的作用，也是个人新的看法。

在这以下，对于几个大家如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论述，都是相当全面的，而且是突出了每个作家的特点的。例如对于司马迁《史记》的评价，在列举《封禅书》《滑稽列传》《酷吏列传》诸篇之后，说：

司马迁这样大胆暴露和讽刺直接管他的汉武帝，这是说明了他是用生命在写《史记》，也说明了他有反抗暴力的战斗精神。班固说他“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后世称《史记》为“谤书”，是有道理的。

《史记》在后汉，曾被统治者一再称为“谤书”。“谤书”是《史记》的一个主要特点。修订本在全面评论司马迁的同时，特别突出了这一著作特点。

对于各代主要的重点作家进行全面的论述，这是一般文学史都注意到的。但著者这个修订本对于当时不被重视的作家也给予了很高的地位。例如，在唐代作家中，于李白、杜甫、白居易之外，对于王维这类作家也做了全面公允的评述。其中说道：

李林甫当权，王维的政治靠山张九龄见逐。他经不起当权派的威胁，自动地放弃了政治生活。他的内心有隐痛，有矛盾，心灵是很静寂的，这静寂即是对现实的抗议。他发出了“住处名愚谷，何烦问是非”（《田家》）的牢骚！他发出了“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的感叹！他有“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隐痛！他有“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酌酒与裴迪》）的心情！此后，他买了宋之问的田庄，过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的生活，过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的生活，过着“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酬张少府》）的生活。充分表现了他对统治阶级的厌恶。

这一段话相当全面地概括了王维这部分诗歌的特点，也概括了王维为人的

一个特点。

5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王维诗歌的评价，在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不都是全面的，也不都是公允的。这里的评述比较符合实际。

当这个修订本出版之前，著者曾经收到不少的意见，他在《编后记》中说他按照大家所提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但也坚持了个人的一些看法，他说：

我进行了几次修改，在修改过程中，对于已经消化过的意见，都遵照修改了；对于未消化的意见，就不知道怎么修改，只有等待提高思想水平再说。

可以看出，对于某些无法吸收的意见，著者也未接受。

与此同时，著者还写了下面这一段话，值得深思。他说：

我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斗争，主要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可不是唯一的。即是说，除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外，还有其他的東西。我们要认识现实主义的复杂性，更要认识文学的复杂性。

很明显，著者对于当时盛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这个提法，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的。他指出“要认识现实主义的复杂性，更要认识文学的复杂性”，乃是针对当时某些人的简单化倾向而发的。

这篇《编后记》写于1956年，这个修订本出版于1958年。这正是古典文学研究界出现某种简单化倾向的年月，而著者能够坚持“文学的复杂性”，实非易事。

最后还要说的是，谭先生这部《中国文学史纲》，始终是在力图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虽也不免受到某种思潮的影响，但是，其难能可贵者，在于他始终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的自己的看法。既坚持了新的科学方法，又不随波逐流，从而完成了这部很有时代特点和个性特点的学术论著。

谭先生是我的前辈，自从1953年相识，倾盖如故，遂为忘年之交。今天阅读他的遗著，并奉命为序，实不胜今昔之感。引笔伸纸，未尽所言。

郭预衡

1933年7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 一、绪 论

### (一)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目的、要求

研究中国文学史，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要求？这是首先要弄明白的一个问题。

在未说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目的、要求以前，应当先说明文学的特殊性，划清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

文学既有感情，又有思想，我们同意 L. 托尔斯泰所说文学要传达感情的说法，但是感情是受思想支配的，没有思想意识的感情是不可想象的东西。一篇文学作品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时候，往往是感染着很浓厚的思想感情。所以普列汉诺夫说：“艺术也表现他们的感情，也表现他们的思想，然而并非抽象地，而借了灵活的形象而表现，艺术最主要的特质就在此。”（《艺术论》）思想与感情在人类意识过程中，本是交互发展、交互渗透的，所以绝不能划出一个不相侵越的界限。不过，感情受思想的支配，是必然的。某人在感情上的喜怒哀乐，是以某人的思想作支配的。同时，思想要借艺术形象而传给别人，由于环境和阶级的限制，所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然而把作品的内容归结为思想，使思想脱离作为思想的源泉的现实客体，这也是不对的。”（依·萨·毕达可夫语，见《文艺学引论》）因而普列汉诺夫的看法，还是不够全面的。即是说，他在说明艺术不是抽象的表现思想时，没有指出艺术是再现客观现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就指出：“艺术本身对人所起的作用比活生生的现实更大。”又说：“艺术作品的目的和作用也是这样，它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而是再现它，充作它的代替物。”（《生活与美学·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告诉了我们：艺术不只是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而且在再现客观现实。

文学与科学同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它们的分野，不是本质的不同，而是表现的形式不同。我们要分别它，只有从表现的形式去寻找，才能找出文学与科学的分野处。用分析和推论的形式写出来的文字，给人以理性的说服，这便是科学；用表现、描绘写出来的文字，给人以形象的感染，这便是文学。所以缅·斯尼柯夫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里说：“从科学上来认识世界，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区